

《人生》与“80年代” 文学的历史叙述

周新民

内容提要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本是关于“80年代”前期文学创作潮流的命名。“80年代”^①的文学历史叙述把它们视为“80年代”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并赋予线性意义。这种文学的历史叙述方式观照《人生》时，忽略了《人生》“呼唤现代化”主题的丰富性，遮蔽了《人生》对于个人价值、主体价值的思考；同时，也遗漏了《人生》丰富的地域文化意蕴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张力的超前思考。通过清理“80年代”文学历史叙述的特质、机制，可以发现，《人生》从传统与现代两种生活相互交织、社会政治与个人价值相互渗透的视野出发，充分表现了变革时代“交叉地带”的复杂境况。

《人生》发表于1982年第3期的《收获》杂志（本文关于此作的所有引文均出自此处，不再一一标注——作者注），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部作品。面对这样一部文学经典，“80年代”文学的历史叙述遭遇了尴尬。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组成的“80年代”初期文学的历史叙述，成为文学史陈规；上述“80年代”文学史叙述，也是阐释《人生》的基本方式。这样阐释《人生》，固然揭示了《人生》某一方面的意蕴，但是，并没有完整地揭示出《人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为了还原《人生》的“真实面目”，本文拟从清理“80年代”文学历史叙述的特性与机制入手，呈现出一部意蕴丰富、复杂的《人生》。

一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的三股文学创作潮流。这三股文学创作潮流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明确的时间先后顺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这两个概念的出现略有先后，各自指称的作品，大体上也可以按时间加以排列。但是，在特征上两

者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晰，有的作品，也很难明确它们的归属。即使那些具有鲜明的类属特征的作品，也并不一律按时间的先后呈现。”^②但是，“80年代”文学历史叙述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命名为“80年代”文学史的不同阶段，且赋予特定规范：“伤痕文学”是“80年代”文学史的肇始，“反思文学”发生的时间在“改革文学”发生之前。这是以线性的时间演进方式来描述“80年代”文学的一种叙述策略。这种文学史描述方式表明，“80年代”文学“先后递擅、依次推进”，“先有暴露‘伤痕’的文学，再有‘反思’、‘伤痕’成因的文学；先有‘向后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再有向前看的‘改革文学’；‘改革文学’是直面现实，‘寻根文学’是反观历史，‘伤痕’、‘反思’、‘改革’文学奉行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寻根’和‘现代派’文学实验的则是外来的现代主义，最后是‘新写实’文学在思想和艺术上总其成，实现历史和现实，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交汇、融合”^③。

依照“80年代”文学历史的线性叙述，《人生》只能属于“80年代”文学历史叙述链条中的一个特定的环节，是“伤痕文学”，或者是“反思文学”，亦或是“改革文学”。事实上，现在通行

的“80年代”文学历史叙述也是这样来叙述《人生》的。孟繁华、程光炜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把《人生》归为“伤痕文学”范畴,认为《人生》与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一起,“开始触及到大量的社会悲剧”,对“‘反右’、‘大跃进’、‘文革’的认识,明显朝着更有深度和广度的方面发展”^④。朱栋霖等认为《人生》是“反思文学”:
“小说在反思高加林个人人生悲剧的同时,深刻批判了固有社会经济体制下巨大的城乡差距给人的尊严和价值带来的戕害”^⑤。陈思和认为,《人生》是“改革文学”:
“以城乡交叉地带为瞭望社会人生的窗口,从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切入社会,既敏锐地捕捉着嬗递着的时代脉搏,真切地感受生活中朴素深沉的美,又把对社会变迁的观察融入个人人生选择中的矛盾和思考当中”^⑥。洪子诚也把《人生》列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⑦。

这种或多或少拘囿于线性目的论的文学史叙述,强化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之间的差异性,忽视了三股文学思潮之间的共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揭露、思考‘文革’对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的阻滞和压抑”;“改革文学”则面对“‘文革’的‘伤痕’和‘废墟’,呼唤、表现在城市和乡村的改革”^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其实有着共时性特征:呼唤现代化。

如果超越“80年代”文学历史叙述的线性规范,我们可以发现《人生》在“呼唤现代化”这一主题上的丰富性:《人生》通过高加林悲剧性命运的书写,引起读者对于不合理的政策对人的压抑的思考;《人生》既具有“反思文学”对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反思和批判的内涵,也具有“改革文学”对于现代文明、城市憧憬的主题。显然,《人生》不属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或者是“改革文学”中的某一类文学潮流,而是综合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特征,分别从三个层面展开了“呼唤现代化”的主题。

高加林曾是一名优秀的民办教师,因为被村支书的儿子顶替而成为农民。通过“走后门”的方式,高加林当上了县委通讯组的干事,工作非常出色,因为被人举报,不得不再次回到乡村。作为一名志向远大的青年,高加林先后两次被迫回到乡村,他的命运无疑是悲剧性的。这也是

“80年代”文学历史叙述把《人生》归为“伤痕文学”的重要原因。

展示高加林悲剧性命运,只是《人生》“呼唤现代化”主题的第一个层面。《人生》并没有简单地“暴露伤痕”,而是进一步思考了造成高加林“伤痕”的原因。不少读者指责路遥“造成”了高加林的悲剧,路遥曾这样回应:

首先应该弄清楚,是谁让高加林们经历那么多折磨或自我折磨走了一个圆圈后不得不又回到了起点?

是生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而不是路遥。作者只是力图真实地记录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发生了什么,根本就没打算(也不可能)按自己的想象去解决高加林们以后应该怎么办。^⑨

路遥在这里明确指出造成高加林悲剧性的原因是社会原因。具体而言,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对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给人带来的伤害,路遥深有体会。路遥出身农村,通过个人努力成为一名城里人,其中艰辛自有体会。路遥还有众多弟妹生活在农村,条件艰苦,其中高中毕业的弟弟王天乐能力最强,最有可能跳出农门。为此,路遥决定帮助王天乐跳出农门。《人生》的创作过程,和路遥帮助弟弟王天乐跳出农门的经历密切相关:“路遥从1979年就开始创作中篇小说《人生》,三起炉灶,三易其稿,反复折腾三年才在1981年创作完成。路遥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因帮助其三弟王天乐改变命运,故他对我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形态有更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后来均在小说中得到体现。也就是说,帮助王天乐跳出农门的事情催熟了路遥创作的《人生》。”^⑩

为了帮助弟弟王天乐跳出农门,路遥和朋友谷溪先后六次通信。这些信件主要是和谷溪沟通、交流并催促谷溪帮助王天乐跳出农门的事情,也流露出了路遥对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思考,尤其是给谷溪的第三封信,路遥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模式有着比较深入的批判和反思:“关于明年招工一事,看来大概只招收吃国库粮的,农村户口是否没有指标?详细情况我不太了解,国家现在对农民的政策具有严重的两重性,在经济上扶助,在文化上抑制(广义的文化,即精神文明)。最起码可以说顾不得关切农村户口对于目前更高

文明的追求。这造成了千百万苦恼的年青人,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构成了国家潜在的危险。这些苦恼的人,同时也是愤愤不平的人。大量有文化的人将限制在土地上,这是不平衡中的最大不平衡。如果说调整经济的目的不是最后达到逐渐消除这种不平衡,情况将会无比严重,这个状况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示出。”^⑩于是,路遥“从王天乐这样有志有为的农村青年的苦闷与奋斗的无望而获得创作灵感,以此来思考一个更深刻的人生话题,思考重新创作数易其稿的中篇小说《人生》”^⑪。

路遥把王天乐的遭际投射到高加林身上,考察了城乡二元结构模式制约下中国农村青年的苦闷与奋斗。高加林高中毕业后,“他们班一个也没有考上大学。农村户口的同学都回了农村,城市户口的纷纷寻门路找工作”。虽然高加林的同学黄亚萍、张克南也没有考上大学,但是,他们有城镇户籍,所以他们都在县城安排了工作。没能上大学的高加林只能回到农村去。最初,高加林当上了民办教师,这是回乡知识青年有可能脱离“农籍”的唯一一条道路。然而,这唯一的可能性,由于村支书的私心,最终也成为泡影。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城乡二元结构模式把农民彻底捆绑在土地上。面对城市只有羡慕、痛恨的情感:“他(高加林——引者注)把粪车子拉在路边停下来,眼里转着泪花子,望着悄然寂静的城市,心里说: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县劳动局局长为了巴结高加林任地区劳动局局长的叔父,私自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让高加林成为县委通讯组干事。高加林在担任通讯组干事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才华,证明了高加林完全胜任这一工作。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桎梏,高加林最终不得不重新回到农村。路遥通过高加林命运的浮沉反思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弊端。这是《人生》表现“呼唤现代化”主题的第二个层面。

路遥有着执着的文学理想,立志要“彻底改变我国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的生活观念和陈旧的习俗”^⑫,这一文学理想契合了“改革文学”要表现“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和与这个要求不相适应的政治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⑬的诉求。与众多“改革文学”一样,

《人生》也构筑了一个文明与愚昧的二元对立结构。乡村人是愚昧的,他们不刷牙,喝的是浑浊的井水。而高加林则代表着文明的一面。他眼界开阔,思想开放,富有文化和学识,“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会装电灯,会开拖拉机,还会给报纸写文章哩”。高加林被看作是“一个崭新的青年农民形象”、“作为一个农村新人,高加林表现出对现代化生活图景的巨大热情”,“他已不满足于仅靠双手做土地上的主人。他盼望汽车、火车、飞机来到家乡,盼望现代物质文明所提供的一切。同时他不满足于乡村文化生活的贫乏,向往着五彩缤纷的现代文明”^⑭。《人生》通过高加林这一文学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乡村对于现代文明的渴望。

《人生》还以高加林的爱情生活为主线,叙述了他和刘巧珍、黄亚萍之间的爱情纠葛。“到大地方去发展自己的前途”是高加林选择人生伴侣的基本标准:“巧珍将来除了是个优秀的农村家庭妇女,再也没有什么发展了。如果他一辈子当农民,他和巧珍结合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现在他已经是‘公家人’,将来要和巧珍结婚,很少共同生活;而且也很难再有共同语言:他考虑的是写文章,巧珍还是只能说些农村里婆婆妈妈的事。上次她来看他,他已经明显地感到了苦恼。再说,他要是和巧珍结婚了,他实际上也就被拴在这个县城了;而他的向往又很高远。一到县城工作以后,他就想将来决不能在这里呆一辈子;要远走高飞,到大地方去发展自己的前途……”由乡村到县城,由县城到大地方,这是高加林的人生理想。这种理想寄予了《人生》对城市的浪漫向往。连同书写“乡村对于现代文明的渴望”的意蕴,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生》“呼唤现代化”主题的第三个层面。

《人生》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呼唤现代化”的主题:高加林的悲剧性命运是《人生》的艺术效果,也是催人思考的艺术触媒;而对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反思,则是把高加林的悲剧性命运引向深入思考的必然结果;通过改革城乡二元结构,让乡村融入现代文明,乃是彻底改变高加林等一代乡村青年命运的根本路径。《人生》的三个层次意蕴,一步步深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生》的深刻内涵。

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思想领域开始清除思想的流毒。随着政治反思的深入，有关个人价值的思考，也成为中国社会开始关心的话题。1980年第5期的《中国青年》发表了署名为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篇文章，连同随之展开的关于人生价值的社会大讨论表明，人生的价值、个人价值已经成为广大青年思考的话题。这场被誉为中国当代青年重要思想启蒙的运动，意味着个体价值开始受到重视。这场发轫于青年人的思想讨论，也对“80年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前，中国当代文学所关注的是个人的历史价值。文学形象的个人思想、性格、言行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成为衡量文学形象美学价值的重要基础。

潘晓讨论之后，一些反映个人价值的文学作品开始陆续发表。1981年《长江》第1期发表了《波动》，《十月》1981年第1期发表了《晚霞消失的时候》。这些小说的主题无一例外地彰显了个体的价值，显然和此前中国“十七年”文学作品的主题完全不同，也和此时正盛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主题有较大差异。这些作品在80年代初期形成了类似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的创作潮流。为什么会形成这股文学潮流呢？有论者作出了这样的分析：“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为消沉颓废、悲观失望的气氛所笼罩，形成了一种由于苦闷、孤独、被遗弃、找不到出路而玩世不恭的风尚。标榜个人生活、自由、存在等放在第一位的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就受到人们的欢迎一样，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青年们处于精神苦闷之中找不到出路，为一种被欺骗、被遗弃感所笼罩，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存在主义思潮就同他们的心情非常合拍。”^⑩这个论断显然符合潘晓来信的基本内容，也契合《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创作实际，同样也和《人生》的题旨有相近之处。

事实上，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广大民众，更多地是在把《人生》作为一部人生的教科书来阅读。《人生》发表后所引起的社会反响，

也证明了这一点。路遥曾这样叙述《人生》发表后的一些个人生活状况：“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在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你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⑪

不能“责怪”读者的“误读”，《人生》的确是一部探讨个人价值的小说。《人生》引用了柳青的一段话作为题记：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人生》题记的指向非常明确，它要探讨的就是个人人生道路的问题。高加林的人生历程也十分契合题记的主旨。高加林的人生理想就是脱离农村、过与父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高考落榜，回农村小学当民办教师，是迫不得已，但还保留了通过考试成为一名正式教师的希望。然而，这希望随着被辞退而破灭。虽然受到刘巧珍的爱情感染，高加林暂时忘却了被辞退的痛苦，但是他始终不甘心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当高加林进城之后，面对黄亚萍的爱情攻势，高加林很快选择了黄亚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黄亚萍能把他带到南京，融入城市，成为一名真正的城里人。

如何处理社会利益、他人利益是区分个人主义的重要尺度。在边沁看来：“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如果承认为了增进他人幸福而牺牲一个人的幸福是一件好事，那末为此而牺牲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以至于无数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省略号为本文作者所加）^⑫。施蒂纳则更加极端地看待个人，他认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都是一种极完善的独特性”，在他看来，个人，这个“唯一者”是世界的核心，

万物的尺度、真理的标准：“我的事业不是神的事业，也不是人的事业，也不是真、善、正义和自由等等，而仅仅只是我自己的事，我的事业并非普通的，而是唯一的，就如同我是唯一的那样。”^⑩在个人主义看来，个体价值是唯一的，也是至高无上的。有人认为，高加林“为了个人目的而把恋爱当做工具”，从而“暴露出了心灵深处的利己主义倾向”^⑪。高加林也因此被定义为“孤独”的个人主义者：“（高加林）从来就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在他看来作一个普通农民，便意味着理想的破灭。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社会分工，存在着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社会应当尽可能地考虑到青年人的具体愿望，但社会不可能满足社会每个成员的要求。当个人愿望与社会分工发生矛盾时，青年应当愉快地服从社会分工，在规定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在小说中，高加林却并非如此。他尽管在农村民办小学已经担任了三年教师，并以出色的工作受到人们的尊重，但他始终没有把改造落后的农村任务当作终生的光荣使命。这就使他不可能建立与广大农民的深厚感情，把生活建筑在想入非非的幻想之上，造成自己在生活信念方面的软弱。”^⑫

同高加林一样，黄亚萍也是把实现个人价值作为人生的目标。黄亚萍上学时就对高加林抱有好感，只是因为高加林回乡当农民才和高加林没有联系。但是，她仍然关注着高加林。同学张克南爱上了黄亚萍，她内心并不爱他，也不讨厌他，由于两家父母亲的热心撮合，她也慢慢地接受了张克南。当高加林成为县委通讯组干事后，她情感的天平很快发生了倾斜：“不管怎样，她想来想去，还是决定非和克南断绝关系不可。不管父母亲和社会舆论怎样看，她对这事有她自己的看法。在这个县城里，黄亚萍可以算得上少数几个‘现代青年’之一。在她看来，追求个人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权力干涉她的追求，包括至亲至爱的父亲；他们只是从岳父岳母的角度看女婿，而她应该是从爱情的角度看爱人。别说是她和克南现在还是恋爱关系；就是已经结婚了，她发现她实际上爱另外一个人，她也要和他离婚！”与高加林一样，黄亚萍也认为“追求个人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高加林

和黄亚萍，是《人生》塑造出来的两个具有现代个人价值观的文学形象，也承载着《人生》对现代个人价值、主体价值的思考。不过，“80年代”文学历史叙述从来也没有把《人生》当做体现个人价值的文学作品来看待，而往往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角度来叙述《人生》，这自有其深刻原因。

按照“80年代”文学历史叙述，“伤痕文学”一般聚焦“文革”对于中国人的肉体和精神伤害，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创伤”^⑬。“反思文学”则表明，“文化大革命”“并非突发事件，其思想动机、行动方式、心理基础，已存在于‘当代’历史之中，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封建主义’的积习相关”^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明显和揭露、批判、反思“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思潮紧密相连。“改革文学”是对正在进行的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历史变革的表现。至于“寻根文学”兴起的原因，文学史家做出如下判断：“在经历了80年代前期政治社会层面的批判之后，产生了将‘反思’深入到属于事物‘本原’意义的趋向，探索历史失误与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之间的关系。”^⑮“改革文学”呼应着中国正在展开的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寻根文学”则从文化层面清理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文化心理与民族意识，落足点仍然是中国社会变革。纵观上文分析，我们可以断定，“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命名和正在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密切相关。而在社会力量支配下的文学命名显然遮蔽了当时客观存在的另外一股文学潮流。有学者指出，以《波动》、《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构成了另外一种文学秩序。这些作品“比起当年名重一时的《伤痕》、《枫》、《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苦恋》等”，“从来没有大红大紫”，但是，“在岁月的延伸中，它们却日渐显示出经得起时光筛选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意义，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可能性”^⑯。

“80年代”文学史叙述把《班主任》、《伤痕》、《乔厂长上任记》界定为文学经典，显然是和80年代初期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像《公开的情书》、《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作品，自然被“正统”的文学史叙述所排斥。

对此,学术界已有较多讨论^②,不再赘述。由此,《人生》张扬个人主义价值观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有论者就认为《人生》“基本上肯定了个人理想的合理性”、“这样正面发泄的结果,只能引起有类似情绪的青年的共鸣和不满:重则埋怨国家,移情于社会主义制度;轻则郁郁不平,抱恨终生”、“除了给社会增添不安定的分子外,别无好处”^③。正是基于上述考量,“80年代”文学历史叙述规避了《人生》“不合时宜”的内容,从被社会所接受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角度来界定《人生》的文学史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高加林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其实是中国新时期“向现代化进军”的历史意识的投影,和西方个人主义思想还是有所区别的。这一问题笔者曾有专门论述,不再赘述^④。

三

1980年汪曾祺的《受戒》问世,随后汪曾祺陆续发表了《大淦记事》、《岁寒三友》等作品。1983年贾平凹发表了《商州初录》。同年,陆文夫发表了《美食家》,李杭育发表了《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受戒》、《商州初录》等作品,与其时正盛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迥然不同,它们关注山川风物、民俗风情、歌谣俚曲,“不再纠缠于现实的政治问题和道德批判,而从生活的纵深方面拈出几分世事沧桑的意境。这使人感到,越过现实的表层倒更容易看清世道人心的本来面目。在这种风格意识的召唤下,一部分小说家的艺术情趣很快转向民间生活和市井文化方面”^⑤。

其实,与《受戒》、《最后一个渔佬儿》、《商州初录》等作品一样,《人生》也关注山川风物、民俗风情、歌谣俚曲。

《人生》饱含深情地叙述陕北山川与地貌:

黄土高原八月的田野是极其迷人的,远方的千山万岭,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用惹眼的绿色装扮起来。大川道里,玉米已经一人多高,每一株都怀了一个到两个可爱的小绿棒;绿棒的顶端,都吐出了粉红的缨丝。山坡上,蔓豆、小豆、黄豆、土豆、都在开花,红、白、黄、蓝,点缀在无边的绿色之间。

庄稼大部分都刚锄过二遍,又因为不久前下了饱垸雨,因此地里没有显出旱象,湿润润,水淋淋,绿葱葱,看了真叫人愉快和舒坦。

《人生》不乏这样充溢着田园诗般气息的叙述。这些有关乡村景物的叙述,充分地表现了陕北乡村的地域特色。《人生》还有较多关于陕北风俗的叙述。尤其是刘巧珍出嫁的程序、饮食、打扮等描写,把陕北乡村出嫁的风俗刻画得十分细腻。值得注意的是,自《人生》开头伊始,一直到小说的结尾,贯穿着信天游:“上河里(哪个)鸭子下河里鹅,一对对(哪个)毛眼眼望哥哥……”信天游不仅体现了小说中人物的思想情感与性格,还充分地表现了陕北地域风情。《人生》还大量运用了陕北方言,强化了小说的地域风味。

如此不厌其烦地罗列《人生》有关山川风物、民俗风情、歌谣俚曲的描写,是为了表明,《人生》其实可以和20世纪80年代初期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乌热尔图的“狩猎文化”系列小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等,置放在一起,是80年代各种各样的地域文化小说中的重要作品。

文学史习惯沿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概念来叙述“80年代”初期的文学。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本属于文学创作潮流概念,是对当时文学潮流的认定和评价。例如,何为“伤痕文学”?朱寨经过考证认为:“‘伤痕文学’的提法,始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后引起的讨论中。之后,人们通常习惯地把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给人民带来的严重内外创伤的文学作品,称之为‘伤痕文学’。”^⑥同样,有关“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命名,也基本上是以当时文学创作的“新”的变化为参照而提出的。不过,时隔30多年,回过头来看,这些基于文学创作潮流的命名,无法准确地描述其时文学创作的状况。例如,王蒙从1979年到1980年所创作的小说,显然无法归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类型之中:“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反思’小说时期,王蒙的涉及‘文革’的作品(如《最宝贵的》、《表姐》、《布礼》、《蝴蝶》、《杂色》、《春之声》、《海的梦》、《相见时难》等),很快就离开那种揭露、控诉的

题材和情感方式,也离开当时普遍采用的历史事件的结构框架。它们表现出更关注人的心灵现实,和对历史理念、逻辑所作的哲理思辨倾向。”^⑧因此,“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史叙述,并非能完全涵盖此时期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与王蒙同时期发表的《布礼》、《杂色》等作品一样,《受戒》、《商州初录》等,也没有被整合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文学史叙述。同样,《人生》丰富的地域文化意蕴也被“80年代”文学历史叙述“遗漏”了。

《人生》虽然表现了“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但是,思考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也是小说应有之义。如果说高加林代表的是现代意识,那么刘巧珍和德顺爷爷就是传统道德的化身。刘巧珍是乡村姑娘,她爱高加林爱得那样质朴,那样地毫无保留和无所顾忌。在传统、保守的乡村,她和高加林的爱情遭受到了父亲的责难,但是,她丝毫没有动摇爱高加林的决心。她憧憬着和高加林的未来生活,她对高加林说“你在家盛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刘巧珍对高加林的爱是无私的。当高加林决定和她断绝关系时,她却为高加林考虑,接受了高加林无情的分手决定,还对高加林千叮咛万嘱咐:“你……去吧!我决不会连累你!加林哥,你参加工作后,我就想过不知多少次了,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一个字不识,给你帮不上忙,还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面找个更好的对象……到外面你多操心,人生地疏,不像咱本乡田地……”当高加林被举报,被清退回乡,刘巧珍并没有对高加林落井下石,反而劝阻姐姐不要去为难高加林,甚至央求姐姐和她一道,去求她公公给高加林安排民办教师的工作。总之,刘巧珍是一个纯朴、善良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德顺爷爷也是一位体现了乡村传统美德的人物形象。高加林本是民办教师,被辞退,心情沮丧,德顺爷爷开导高加林。为了减轻高加林的体力劳动重负,也为了撮合高加林和刘巧珍,他出面找村支书,为高加林找到了到城里拉粪的轻松工作。然而,他一心呵护的高加林最终背离了传统道德,抛弃了刘巧珍。于是,德顺爷爷以乡村道德守护人的角色,训诫高加林:

“你把良心卖了!加林啊……”德顺老汉

先开口说。“巧珍那么个好娃娃,你把人家撵在了半路上!你作孽哩!加林啊,我从小亲你,看着你长大的,我掏出心给人说句实话吧!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呀还是入地呀!你……我什么话都是敢对你说哩!你苦了巧珍,到头来也把你自己害了……”老汉说不下去了,闭住眼,一口一口长送气。

德顺爷爷,包括刘巧珍,体现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的传统美德。这两位人物形象身上也寄予着路遥对于传统美德与现代生活之间关系的思考:“这两个人物(指刘巧珍和德顺爷爷——引者注),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简单地看作是带有封建色彩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希望呢?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这样一种美好的品德,都是需要的,它是我们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最基本的保证。”^⑨肯定刘巧珍、德顺爷爷所代表的传统美德,是路遥对传统与现代两种文明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路遥认为,在现代文明日益发展的今天,传统道德依然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们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生活中大量存在着。造成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当然是很多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克服这种不幸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很难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⑩

《人生》这部小说并没有仅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思考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的价值,还进一步思考了人与土地的关系。高加林出生农村,成长于农村,在农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眼界的开阔,这位农村青年,渴望走出农村,随之身上的泥土味也越来越淡。眼见民办教师当不成了,逃离农村的机会幻灭,高加林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充满了厌恶,以自虐的方式惩罚自己。是刘巧珍的爱情抚平了高加林的心灵创伤。但是,他并不甘心娶刘巧珍这位乡

村姑娘为妻。即使和刘巧珍沉浸在爱河之中，高加林仍心有不甘，为自己可能在农村呆一辈子而感到悲伤。当成为县委通讯组干事后，高加林以为脱离了农村。为此，他与刘巧珍分手，和城市姑娘黄亚萍相恋。随着“走后门”的事情败露后，高加林再次回到了农村。德顺爷爷，这位乡村代言人再次出面引导高加林：

德顺爷爷用缀补钉的袖口揩了一下脸上的汗水，说：“听说你今上午要回来，我就专门在这等你，想给你说几句话。你的心可千万不能倒了！你也再不要看不起咱这山乡圪了。”他用枯瘦的手指头把四周围的大地山川指了一圈，说：“就是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是的，不会有！”

历经逃离土地再次重归土地的高加林，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认同了德顺爷爷的指引：“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我的亲人啦……’”随着高加林扑倒在德顺爷爷脚下，《人生》最终完成了“逃离土地——皈依土地”的叙述结构。敏锐的读者从中发现了端倪，批评路遥隐藏在《人生》中的“恋土情结”^⑤。“恋土情结”其实就是土地崇拜，是发生在农业文明时期的精神信仰：“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⑥这种对土地的依赖，是“恋土”情结形成的根本原因。随着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展开，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对松散，但是，“恋土情结”作为一种精神信仰，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从这个角度来讲，“恋土情结”在现代社会仍然有着重要价值。

《人生》发表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寻根文学”的理论探讨，韩少功的《文学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相继发表。文学为何要把笔触伸进文化岩层？韩少功曾作出了这样的解答：“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⑦“寻根文学”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并非是要我们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去。正如有学者所

言：“‘寻根’当然不是简单的复古，不是保守的，它站立在现代性的高度，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来思考中国文化的命运，来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价值标向。它比那单纯的现代意识显得更加高瞻远瞩，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对于文学来说，已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出示范，它们恰恰是在回归本土，在重新思考现代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诸多难题的前提下，而写出了令西方第一世界惊叹的不朽之作，他们甚至因此摘走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真正‘现代’的文学意识”^⑧。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寻根文学”以现代思想为参照，旨在思考传统文化的价值。1982年《人生》发表之时，路遥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有着先觉者般的思考：“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意识和传统美德的冲突，等等，构成了现代生活的重要内容。”^⑨路遥清醒地意识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传统道德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人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思考，从发表时间上看，早于“寻根文学”的理论倡导与创作实践。虽然，拘囿于发表时间，《人生》没有被纳入“寻根文学”的阐释视野，但是，它对于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思考不应该被“80年代”文学历史叙述所“遗漏”。

《人生》表现了“交叉地带”的社会生活。路遥曾对《人生》“交叉地带”的特殊生活领域有过比较系统的陈述。为了深切地了解路遥的思想，更好地理解《人生》，特照录路遥关于“交叉地带”的论述：“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发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触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社会大动荡，使得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和返乡加入农民行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

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精神道德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又是那么突出和复杂”^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相互交流，使农村渐渐摆脱了传统生活方式，出现了向往城市的心理倾向。但是，传统价值观并没有完全消失，仍然影响着农村人的生活。城乡之间这种复杂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于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复杂情感，造就了《人生》这部小说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人生》既有传统乡村渴望融入城市的内容，也有作为农村人祈求拥有现代价值观的心理动因，还有渐渐迈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回望与思考；《人生》既是对现代化社会图景的热切盼望，也是新的历史期个人价值受到重视的写照。上述内容相互交叉相互熔铸，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内涵无法在“80年代”文学历史叙述中得以展现。不过，我们以“80年代”文学历史叙述作为参照，仍能窥见《人生》的丰富性、复杂性与作为“80年代”文学的经典性。

①本文所指的“80年代”文学是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至1989年间的文学，特此说明。

②⑦⑧⑨⑩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56—257页，第258页，第258页，第257页，第258页，第323页，第261—2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於可训：《论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叙述视角》，《文学评论》2000年5期。

④孟繁华、程光炜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2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⑤朱栋霖、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下），第1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24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⑨⑬⑭⑮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全集》第133页，第109页，第133页，第3页，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⑩⑪⑫梁向阳：《新近发现的路遥1980年前后致谷溪的六封信》，《新文学史料》2013年3期。

⑭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3期。

⑮梁永安：《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也谈高加林》，《文汇报》1982年10月7日。

⑯易言：《〈波动〉及其他》，《文艺报》1982年4期。

⑰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⑱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5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⑳㉑曹锦清：《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加林形象》，《文汇报》1982年10月7日。

㉒张志忠：《有待展开的当代文学可能性》，《文学评论》2010年4期。

㉓参照下列代表性论文：程光炜：《文学的紧张——〈公开的情书〉、〈飞天〉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南方文坛》2006年6期；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2期；陶东风：《一部发育不全的哲理小说——重读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4期。

㉔方直：《评〈人生〉的社会效果》，《当代文学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9期。

㉕参见周新民《“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话语研究》，第34—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㉖李庆西：《寻根：回到事物本身》，《文学评论》1988年4期。

㉗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第5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㉘王愚、路遥：《关于〈人生〉的对话》，《星火》1983年6期。

㉙路遥：《关于〈在困难的日子〉》，《路遥文集》（散文·随笔·书信），第154页，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㉚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

㉛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4期。

㉜陈晓明：《个人记忆与历史布景——关于韩少功和寻根的断想》，《文艺争鸣》1994年5期。

㉝㉞路遥：《面对新的生活》，《中篇小说选刊》1982年5期。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 艳